



晋商文化书系

晋商文化书系

# 山西票号研究综述

SHANXIPIAOHAOYANJIUZONGSHU 解洪文◎著



■晚清至解放前一种介于钱庄与银行之间的旧式金融组织。总号设于北京，分号遍于各省市，所发庄票随处皆可汇付。因其执事者山西人居多，故称‘山西票号’，也称山西票庄。

■道光以来，晋商进入第三次大发展阶段。这个时期晋商的特点是：山西商人首创的山西票号，随着票号业的发展，山西商人逐渐执中国金融界之牛耳。同时，由于商业资本与金融资本的结合，山西商人成为当时国内商业和金融界一支举足轻重的力量。

山西出版集团  
山西经济出版社



### 作者简介

---

解洪文，1970年12月出生，山西万荣县人，大学学历，经济师职称。1992年参加工作，先后在省级以上刊物发表文章50余篇，所撰写的课题研究也先后在人民银行总行、天津分行、太原中心支行获奖。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山西票号研究综述/解洪文著. —太原:山西经济出版社, 2010.1

ISBN 978-7-80767-271-5

I. 山… II. 解… III. 票号—研究—山西省 IV. F832.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235915 号

## 山西票号研究综述

---

著 者:解洪文

责任编辑:刘晓宇

---

出 版 者:山西出版集团·山西经济出版社

地 址:太原市建设南路 21 号

邮 编:030012

电 话:0351-4922133(发行中心)

0351-4922085(综合办)

E-mail: [sxjfx@163.com](mailto:sxjfx@163.com)

[jingishb@sxskcb.com](mailto:jingishb@sxskcb.com)

网 址: [www.sxjcb.com](http://www.sxjcb.com)

---

经 销 者:山西新华书店集团有限公司

承 印 者:太原红星印刷厂

---

开 本:787mm×1092mm 1/16

印 张:12.25

字 数:170 千字

版 次:2010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2010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80767-271-5

定 价:26.00 元

---

## 目 录

《山西票号研究综述》读后感( 代序 ) .....	1
前言 .....	1
第一章 关于汇票与票号起源说的研究 .....	15
第二章 关于票号产生前历史背景的研究 .....	21
第三章 关于票号产生的研究 .....	37
第四章 关于票号发展及其原因的研究 .....	43
第五章 关于山西票号衰败原因的研究 .....	52
第六章 关于山西票号历史地位的研究 .....	76
第七章 关于山西票号揽办捐项作用的研究 .....	86
第八章 关于票号汇兑公款与民族资本工商业 发展关系的研究 .....	92
第九章 关于票号与洋务运动关系的研究 .....	102
第十章 关于票号与左宗棠关系的研究 .....	107
第十一章 关于票号与清政府关系的研究 .....	110
第十二章 关于票号性质的研究 .....	122
第十三章 关于山西票号资本性质的研究 .....	134
第十四章 关于票号与利息行市的研究 .....	141
第十五章 关于山西票号知人育人用人的研究 .....	146
第十六章 关于票号经营形态的研究 .....	153
第十七章 关于票号管理制度的研究 .....	160

第十八章 关于票号在近代中国民族工业发展史上所起 作用的研究 .....	175
后记 .....	182

## 《山西票号研究综述》读后感 (代序)

解洪文同志是一位十分敬业的金融工作者，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我读了他写的这个书稿后，觉得作为一个金融工作者，他读了许多关于金融史方面的书，而且读得都很认真，提出了许多问题。在目前学术界浮躁之风盛行之时，难得他读书读得如此认真，因而抓住了问题的要害，排比出了研究票号的学人们在一些问题上各自观点之间的差异。这不仅对票号研究的深入发展有好处，而且对于纠正学术上的不正之风也是有好处的。仅从他认真读书的情况，亦可以感知他在做事方面的认真和敬业。

票号，作为近代中国晋商金融行当里的巅峰之业，为世人所瞩目。票号的诚信精神，票号利国利民的经商理念，票号高瞻远瞩的进取视野，票号与时俱进的创新勇气，票号经营管理体制上的实践与理论创新，都为我们留下了极其宝贵的精神财富。欣赏它的人，尽量挖掘它所创造的精神财富，以为后人师；批判它的人，则坚定地站在所谓无产阶级革命立场上，对其进行批判，说它“发国难财”，是“暴发户”，以至于把它当作敌人，认为它在近代中国，不发展生产力，使生产力萎缩，给近代中国人民造成灾难，“使之陷入更加贫困的境地”，有它还不如没有它。何以会出现如此巨大的反差呢？我觉得这里有一个对于极“左”思潮的反思问题。

自从1957年反右运动以来，真正敢于讲真话的人，必须拿出舍得“一身剐”的精神。就高层人士而言，彭德怀在庐山会议上讲了真话，落了个“一身剐”。刘少奇在“七千人大会”上，就饿死数

千万计的农民,讲了“三分天灾,七分人祸”的真话,也因而遭忌,落了个“一身剐”。至于下层老百姓,因讲实话、真话而遭迫害者,更是不计其数,造成了许多人不论遇到什么问题,总是宁“左”勿右。尽管改革开放已经30余年了,然而,鉴于极“左”思潮的余威,人们还是认为“左”比“右”保险,不愿意讲真心话。但我仍然不死心,还想在这里讲几句真话,为咱老祖宗及先贤们争得点应有的历史地位,这就是关于资本家与雇员之间的关系:是阶级对立、对抗乃至斗争的问题,还是可以和谐共处、合作共赢的关系?

在差不多同一个历史时期,即19世纪20年代至60年代,由于各自不同的社会背景,东方商人与西方哲人在对待资本家与雇佣劳动者或雇员这个同一类问题上,认识是不一致的。西方哲人从商品、货币入手,进而探求资本的产生、阶级的形成以及资本家与雇佣劳动者的关系;东方商人则从晋商的东伙合作制开始,对资本所有者(即资本家)与经营者(经理、雇员)的合作模式,进行了一个多世纪的实践。尽管前者是理论研究,后者是具体的经营实践,但核心内容,都涉及资本家与雇佣劳动者或雇员的关系问题。我正是由于研究票号在经营实践中这一现象的缘故,才怀着崇敬的心情,几次三番地仔细阅读了马克思的《资本论》。但我看到的,只是资本家与雇佣劳动者(或雇员)的消极依存,却没有看到资本家与雇佣劳动者(或雇员)为了共同的利益,亲密无间的合作。按照马克思的资本理论,只能得出阶级对抗的结论。而中国票号,在一个多世纪的活生生的经营实践中,却证明了另外一种情形:即资本所有者(即资本家)可以和经营者(经理、雇员或雇佣劳动者)通过资本化了的人力股,结合得既亲密而又平等,可以说是“有阶级而不对抗,有贫富而不斗争,和谐共处,共创双赢”。这种资本所有权与经营管理权以及人力资本化的两权分离模式,使雇员的主动性能充分得到发挥。这种状况,对于我们有没有启示?我们应当如何评价这种历史现象,如何继承这一份珍贵的历史遗产?实在是耐人寻味的。

在这里,我绝对没有贬低马克思《资本论》在理论方面的深刻意义。但我也不能由于马克思没有提出过此理论概念,而在中国人的实践中早已创立并实行了资本家与经营者(人力资本化了的雇员)可以和谐共处、合作共赢的经营模式及其范例而湮灭了中国人在经济活动中的智慧。为此,我们有必要把这一事实昭示社会,以供那些有天赋的理论家们研究,以创造更新的理论。

近日,解洪文同志所写的《山西票号研究综述》书稿,经由山西经济出版社的刘晓宇同志阅后寄我,并要我发表自己的看法。我觉得,解洪文同志以这种述而不评的方式,把山西票号研究中的各种观点排比列出,既是对前一个历史阶段票号研究中的一些问题的认真梳理,又是对今后票号研究的有力促进,有利于票号研究的深入发展,是件大好事。同时,随着讨论的深入,它将对正确认识中国人的金融智慧、企业经营管理智慧,树立中国人的自信心,也都是大有益处的。所以,它的出版无疑是必要的,是有价值的。

至于把马克思《资本论》中揭示的资本本质、阶级对立与对抗的思想、理论与经由雷履泰集晋商东伙合作制之大成而进一步规范化、契约化了的票号资本家与经营者(含雇佣劳动者)可以和谐共处、合作共赢的经营模式对照研究,则是解洪文书稿中原本没有的议题,而是我多年来思考的、至今没有解决的一个问题,只是想借此机会把它提出来,以供关心它的人们深入探讨。这样的对比研究,也许在一些人看来,有点儿对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揭示的思想、理论有大不敬之嫌,老实说,我从来没有这样想过。但我觉得,即使被人怀疑,也要把它提出,因为,这是事关国家发展、民族兴衰的大事,不能不讨论清楚。

回顾“八大”以来,我们亲身经历过的这段中国发展史,我们不得不对这种以阶级斗争为纲的理论产生质疑。1956年的中共“八大”决议认为:在我国“三大改造”已经完成,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已经基本解决,社会主义制度已经基本建立起





来,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阶级斗争已经过去,我们急需解决的主要矛盾是人们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们的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然而,“八大”决议的墨迹未干,阶级斗争的大旗又举了起来。1957年,全国各地按照比例抓右派,这一年共抓右派3 178 470人(郭道晖:《毛泽东发动整风的初衷》,见2009年《炎黄春秋》第2期,第10页),占1949年全国小学毕业以上知识分子74 185 000人(见《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6月版,197页)的23.3%还多,是我们实际公布50多万右派分子的5.6倍。说右派是内部矛盾,实际处治较之敌我矛盾有过之而无不及。以此而家破人亡、妻离子散者,不计其数。从此,我们国家陷入“万马齐喑”的局面。此后,钢铁元帅升帐,各行各业让路,千军万马上山,砍树、挖矿、炼钢;粮食亩产放卫星,一时间,稻谷亩产13万斤(6.5万公斤),小麦亩产12万斤(6万公斤),山药卫星更罕见,亩产120万斤(60万公斤)。人们明知是胡闹,是吹牛皮,但不敢反对,否则,不是右倾,就是白旗,而遭批斗。致使“棉花吊了孝,柿子上了吊,谷子撒遍地,豆子放了炮”,丰产而不能丰收。加之大搞人民公社,大办食堂,提出所谓“一天等于二十年,跑步进入共产主义”口号,大刮浮夸风、共产风,极大地挫伤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浮夸风带来的是高征购,有的地方甚至有这样的命令:“完不成征购提头来见”(杨继绳:《“通渭问题”大跃进五十周年祭》,见2008年《炎黄春秋》第10期,第41页);高征购则夺去了农民的基本口粮,造成了三年大饥荒。在饥饿中挣扎的人们,想外出逃荒,也不让跑,活活饿死几千万。随后,又是“四清”、“文化大革命”,下自生产小队,上至中共中央,斗了几十万乃至上百万的大小“走资派”,把我们的国民经济斗到了“崩溃的边缘”。这正是这一理论在极“左”思潮指导下给我们带来的恶果。

马克思讲的是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资本的积累导致了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对立、对抗,而我们在已经完成“三大改造”,

国有经济在国民经济中占压倒优势时,我们又口口声声地说工人阶级是领导阶级,人民当家作了主人,难道还有两个阶级的对立?这岂不是荒唐吗?!如果真有,岂不是自打嘴巴?如果没有,那岂不是为了个人争权,故意人为地制造矛盾,挑起群众斗群众吗?这实际上也是民粹主义者对于农民小生产者的一种恐惧心理。他们想当然地以为用人民公社这种形式,对农民实行准军事化管理,就可以从根本上铲除滋生资本主义的土壤。实际上,他们错了,而且是彻底地错了。因为从一种社会形态到另一种社会形态的过渡,绝不是某个个人意志能转移得了的。列宁缔造的苏联共产主义,在卫星上天、核弹慑世的情况下,由于不符合社会发展规律,加之特权阶层制造的特权,使整个社会不能和谐发展而自行解体,就已经说明了这个道理。我们今天能不能解决这一问题,能不能和谐发展,这是每个有责任心的中国人都在思考的问题。我觉得,晋商创立的东伙合作制与经由票号经理雷履泰规范化、契约化了的人力资本股的票号经营模式,只要加以改进,就可以成为解决民营企业和谐发展的最佳途径之一。而西方企业家在其企业中,实行的内部职工持有股(尽管它与票号的人力股有所区别,但其基本精神是一致的)的模式,是解决国有大中型企业和谐发展的最佳途径之一。我之所以强调票号资本家与通过人力资本化了的经营者之间的关系,正在于此。试看今天西方许多大企业实行的内部职工持有股,就可以说明这种人力股或内部职工持有股在现代企业发展中的效应。

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财富迅速集中。据统计,19世纪50年代中期,占美国人口1%的人占有了全美私人资本股份的50%。这种严重的“两极”分化,严重地阻碍着美国广大职工的生产积极性。其时,美国的一位经济学家针对这种状况,提出了一条著名的论断,他说:“除非把资本所有权分散到千千万万人的手中,使社会许多人都拥有一定的资本,否则,很多问题无法解决。”为此,他主张极大地分散资本所有权,并建议政府,要求企业通过

赠送或以优惠的价格允许职工购买等方式，让职工拥有股票，成为拥有资本的雇员。这一建议，引起美国国会的重视，并先后为此颁布了 20 多项法规，支持雇员拥有股票计划，明确要求实行雇员持股计划的企业，要根据社会公平原则、经济效益原则和政府收益原则进行经营。对职工则规定了参与原则、限制原则、利益分享原则。由于得到了政府法律的明确保证，美国雇员持有股票的计划迅猛发展。据统计，到 1990 年，企业内部职工拥有股票者是 11 000 万人，几乎占到美国当时人口的一半以上（见史若民著《平、祁、太经济社会史料与研究》，山西古籍出版社，2002 年版，第 112 页）。美国企业之所以有活力，社会相对和谐，而少有罢工，这就是其中的奥秘，以此也就可知那种资本导致阶级对立、对抗理论的局限了。

诚然，在资本主义社会，资本可以导致阶级的对立、对抗，但是只要使用得当，即使在资本主义社会，它也可以弥补由它造成的裂痕，使资本所有者和经营者（通过人力资本化或人力股权化）的合作，创造双赢，何况我们还是社会主义的国有经济呢！

对于这一点，中国人早在明代隆庆（1567—1572）年间就使用了，这就是“有无相资，劳逸共济”的东伙合作制。它是中国传统文化合和思想在经济活动中的产物。它的使用，如果从隆庆末年的 1572 年算起，较美国早了近 300 年，如果从经由雷履泰为代表的票号经理们，契约化、规范化了的人力资本股的票号创立的年代 1824 年算起，比美国早了 132 年。

然而遗憾的是，我们向西方学习时，考虑到夺取政权的需要，只学了阶级斗争和所谓无产阶级专政这一招，却对西方为了社会和谐和经济发展的其他招数没有重视。更为遗憾的是，连我们祖宗几百年来行之有效的东伙合作制，也都批了个一塌糊涂。1949 年 4 月，刘少奇到天津视察，就如何对待资本家时指出，“今天资本主义剥削是合法的”，要做到“劳资两利”。强调了东伙合作，搞好关系，发展生产。与此同时，毛泽东接见太行区党委时，也做过

类似的指示。谁知建国后,这竟成了刘少奇的罪过。什么“阶级调和论”“阶级斗争熄灭论”,等等,不一而足,直到把刘少奇斗死为止。执政者谋资本家与劳动者关系之调和是“人类的幸福”,这是我们党的创始人陈独秀的思想(盖军:《早期陈独秀是社会民主主义者》,见2008年《炎黄春秋》第9期,第64-65页)。然而,在取得政权之后,我们却不思继承传统文化中的优秀部分,使劳资双方的矛盾消弭于无形,也不思建立和谐社会,反而一味争权,不惜以所谓的无产阶级专政推动所谓的“文化大革命”,并以“造反有理”,蛊惑青年人到处造反夺权,人为地制造了“十年动乱”。再强大的国家,也经不起不停气儿的斗争和折腾,何况我们还是个穷国、弱国呢!

往事不堪回首,教训不应忘记。时至今日,改革开放已经30余年了,极“左”思潮并没有因此而销声匿迹,还在以各种形式时时干扰着我们的改革开放大业。其中,对照我们的《宪法》,近年来发生的重庆“彭水诗案”、山西“稷山文案”、海南“儋州网案”、安徽“五河短信案”、河南“高唐诽谤案”都是侵犯人权的,都是只有在极“左”思潮盛行时期才会出现的“文字狱”。而在强调法治的今天,居然再次出现了上述无法无天的侵犯人权的最新版本,至今未能得到彻底解决(《那些“跳档新闻”从此了无声息?》,见《生活文摘报》,2008年,第51期)。2003年,河北徐水的“孙大午案”(见《炎黄春秋》,2009年,第3期)则是这种思潮在金融领域制造出来的最新冤案。在学术界,也还有那么一些人,利用改革开放中的一些不尽如人意之处,以极“左”思潮的思维定式来评断历史,混淆是非,妄图搅黄我们的改革开放大业。对此,我们绝不能掉以轻心。

至于在票号研究领域里,由于受极“左”思潮的影响,而对票号历史制造的谎言,一定要本着历史主义的态度,将其放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中予以考察。且要耐得住寂寞,以坐穿冷板凳的决心,逐条核对原始史料。逐段、逐句体会原版理论,只有如此认真,才

能去伪存真,还历史以本来面目。切不可人云亦云,上当受骗,使先贤受委屈,给历史添谎言,使我们这些还可以算作是从事历史教学的人,反倒成为历史的罪人。

当我阅读到本书稿中罗列的一些不同观点时,想起曾经发生的一个学术讨论中本不该出现的故事,也与这一思潮有关。2005年8月,在太原晋祠召开了一次国际晋商学术研讨会,会上我就票号资本性质研究中的有关问题发了个言,指出有人在研究票号问题时,使用理论的态度不严肃,引用的史料不可靠,所下的结论与史实不符(我的发言:《从光绪廿二年至廿三年日升昌长沙分号流水账看票号资本的性质》,见《中国晋商研究》,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89—208页)。会后,这位先生在晚餐后餐桌上只剩下我们二人时,对我说:“您的文章,等于给我写大字报。我有那么多博士生,你就不害怕吗?”我听了很是震惊。学术讨论是求真理的一种方式,不是搞一言堂,有不同意见很正常。它毕竟不是打架,弟子多,又能怎么样?博导培养博士,是让学生在专业领域追求真理,创新理论,更好地服务社会,并非让您在学术上培植私人势力!我真不敢相信一位博导,在听到一点批评意见后竟能够说出如此有失身份的话。真的是太煞风景了!

至于弟子与导师的关系,按照中国民间的说法,叫做“一日为师,终身为父”,弟子对导师那是十分的尊敬!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传统文化中有“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的重要功能。假如导师“强不知以为知”,不仅不能给学生解惑,反而传授了些邪门歪道的东西,那就不一定会受尊敬了。章太炎是近代中国鼎鼎有名的国学大师,他的老师是近代经学大家俞樾,对传统文化的整理有重大贡献。章太炎师从俞樾整整七年,对其很是尊敬。当他的老师不能与时俱进时,他毅然写了著名的《谢本师》一文,公开宣布与俞樾断绝了师生关系。此后,他就传统文化资源的简择问题,提出了两条标准:一曰“学以求是,不以致用”;二曰“用以亲民,不以干禄”(见《章太炎全集》第4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9月

版,第207—208页)。前者是坚持实事求是的态度,把追求真理、真实、真相看做是最高标准,摒弃短视的实用主义态度;后者是坚持以利于民众、民族为根本出发点,摒弃一切迎合权势、曲学阿世的恶劣风气。他的这种学术上的独立人格,为后世所敬仰。我想,作为21世纪的硕士、博士,应该是我们国家的栋梁、时代的先锋、民族的灵魂、社会正义的卫士、科学技术的中坚,具有独立人格,当然,更是其中应有之义了。所以,我衷心地希望这位博导,让他的学生好好读读我的有关文章,对我赐教,我将不胜荣幸感激之至。

我不想在票号研究的问题上,使自己成为罪人,我也不想让那些制造谎言的人,继续误人子弟,我更愿与一切有志于研究票号的学人共勉,把祖宗留下来的这份珍贵遗产继承下来,把票号先贤们的诚信创新精神、合作共事风范,发扬光大。对与不对,就算抛砖引玉,做个开场白吧。

史若民

2009年5月4日写于山西师大

## 前 言

我是一名金融工作者,对山西票号没有什么研究。但山西票号何以“执中国金融之牛耳”达百年之久的疑问,常常萦绕于心头。“读书能见道。”好奇心驱使我去认真地拜读一位位专家的专著、一位位学者努力探索的论文。从此,陈其田、卫聚贤、黄鉴晖、史若民、孔祥毅等一大批专家、学者都成为我未曾谋面的老师,他们研究山西票号的一本本专著、一篇篇论文都成为我学习、研究山西票号的“领路人”。我深深地明白:我是紧跟在众多专家、学者之后,尽力前行的一名“后来者”,没有他们的研究成果,就没有今天我在山西票号方面的点滴认识和尝试。

对山西票号的研究,始于19世纪70年代一些西方国家的领事对票号作用的论述。20世纪初,时称东洋的日本,更是对山西票号注意有加。20世纪二三十年代,票号中人自我总结者有之,国内学者开始搜集资料进行研究者亦有之。然而,为时不长,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对山西票号的研究在出了一些初步成果后不得不暂时搁浅。直到1961年《光明日报》发表了一篇关于票号的文章,学术界才迎来了票号研究的新生。可惜的是,在那极“左”思潮肆虐的日子里,学者们对山西票号的研究,不能不带有浓厚的政治色彩。粉碎“四人帮”以后,随着思想解放和改革开放的深入,学术界开始活跃起来。于是,1982年6月,山西财经学院在太原举行了新中国成立以来首次山西票号学术讨论会。以此为契机,对山西票号的研究逐渐形成了一个热潮,至今,这一研



究还在持续升温。这期间,最突出的表现有以下三点:一是研究山西票号的史料日益丰富。其中,1990年首次出版的由中国人民银行山西省分行和山西财经学院以及黄鉴晖教授联合编著的《山西票号史料》以及2002年5月史若民教授编著出版的《平祁太经济社会史料与研究》最具有代表性。前者搜集整理了现在存世的清廷有关票号的档案以及当时报章杂志的文字资料;后者搜集整理了既不见之于档案,又不见之于报章杂志,而是留存于平祁太民间的票号以及票号以外的其他晋商留存的账簿、笔记、碑刻、信函、文稿、各类商业学徒教科书等资料。正如博士生导师行龙教授在《中国晋商研究》一书中所说的那样:“……这些珍贵的历史资料的汇集,为晋商及其票号的研究提供了方便。”《山西师大学报》在2003年第2期也专门对史若民的《平祁太经济社会史料与研究》予以评介:该书“尤其是对平祁太三地碑刻、笔记、账册、信函、文稿、对联、行规的搜集、整理,抢救了大量的资料,填补了档案之外的许多史料空白,开拓了晋商历史文化研究的一个新领域,对今后有关山西票号与中国经济史的研究将起到重要的促进作用”。二是研究山西票号的队伍不断壮大。继黄鉴晖、史若民、孔祥毅等一批研究票号的专家之后,一些在校大学生、研究生及博士生也以山西票号为题进行研究。其中,张桂萍同志的博士毕业论文《山西票号经营管理体制研究》,从追溯亚当·斯密《国富论》中的固定资本理论内涵和美国经济学家舒尔茨等的人力资本理论概念着手,集中分析了山西票号经营体制中顶身股的问题引起了专家学者们的关注。三是对山西票号中一些热点话题的研究呈现出趋同性。随着对山西票号史料的不断发掘,专家学者们本着实事求是、客观公正的研究态度,对山西票号的产生原因、产生背景等问题的研究正趋于一致,但对有些问题的研究,还在“争鸣”中。至于对票号研究中的不同观点,《晋商旅游文化区志》一书有过提及,然而,它毕竟是着眼于旅游文化,所以不疼不痒,不能深入,尤其对影响很大,乃至出现在财经院校基础课教材中的票号是



“高利贷”、“暴发户”等论说，则避而不谈，这就很难推动票号研究的深入发展。为此，本人不揣鄙陋，仅就阅读所及，罗列以下问题，并将在这些问题上的各家观点依次列出，包括了中国成立以来研究山西票号的所有论文和著作中的有关论点，以为票号研究综述，目的是为了给对山西票号有兴趣的读者了解、研究山西票号提供方便。因书中许多论题内容都与1992年8月由山西经济出版社出版的黄鉴晖先生所著《山西票号史》及1992年10月由中国经济出版社出版的史若民先生所著的《票商兴衰史》这两部最具代表性的专著相关联，为此，特将这两部专著的大致情况先行予以介绍。

史若民先生是山西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的专职教师，他写《票商兴衰史》是为了纪念前贤。正如他在该书前言中所说，他的目的“更多地则是出于一种对有过贡献的，而又由于某种原因不为封建统治者所重视的历史人物的纪念”。黄鉴晖先生是山西财经大学金融系的金融学专职教师，他写《山西票号史》，主旨则在于“研究山西票号”。虽然他曾经是“杨荣晖”集体写作班子中的一员，上世纪60年代参与写作《山西票号的性质与作用》，说票号是封建高利贷金融机构。但他后来终究还是勇敢地拿起马克思的生息资本理论对票号重新审视，揭示了票号资本的借贷资本性质，这是该书的贡献之处。至于人类历史进程中高利贷的“革命”作用，他却讳莫如深，甚至于在他的同道断章取义地用马克思的理论，把票号作为高利贷而大张挞伐时，他也始终对其明显的错误之处没有予以揭露，应当说是其软弱之处，或者说，在理论上还存在盲点。

史若民先生是中国近代史方面的专家，由于其主旨是在于纪念前贤，继承前贤的优良传统，因而，他不仅运用马克思的生息资本理论研究票号，揭示票号资本的借贷资本性质，重要的是，他从推动人类历史进程的角度出发，撇开传说中的荒诞之议，高屋建瓴地从明清以来的经济政策、城镇发展、商业贸易、金融演变等方